
国际货币基金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对美国国会投票的分析

熊爱宗*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会单个议员和国会整体两个层面通过二值选择模型分析美国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影响。在单个议员层面,对议员政党属性、意识形态倾向、相关利益集团、所在选区利益四个因素的经验检验显示:议员来自民主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倾向越强,获得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越多,将越支持基金组织议案,而选区金融产业发展程度则与议员的投票行为具有负相关关系。在国会整体层面,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对国会通过基金组织议案影响显著,美国良好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国会通过基金组织议案。

关键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政治经济分析 美国国会 全球经济治理

一 导言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成为重要内容。在2008年二十国集团(G20)首次领导人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推进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以使其更加充分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提高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随后在二十国集团历届领导人峰会上,推动基金组织改革一直成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得到各国

* 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100732 电子信箱:xiongai-zong@163.com。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孝松和杨连星、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谢申祥以及匿名审稿人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意见和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领导人的支持。

基金组织改革主要涉及三类决策主体。一是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协定》)规定,执董会负责处理基金组织的业务,行使基金组织理事会所授予的一切权力。执董会可以对基金组织一般事项做出决定,但是份额增加、《协定》修订等重大事项则需提请理事会批准。二是基金组织理事会。理事会是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协定》规定,《协定》下的一切权力,凡未直接授予理事会、执董会或总裁的,均属于理事会。三是基金组织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对于一些重大事项,在理事会批准之后,还需全体成员国同意,而这大都需要各国立法机构批准。只有理事会获得各国立法机构批准的份额比例达到改革方案需要的比例,改革方案才能最终生效。因此,基金组织的一些重大改革最终能否完成不仅取决于基金组织内部决策机制(执董会和理事会),还取决于成员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立法机构。

国内立法机构的介入使得基金组织改革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基金组织重大改革事项的达成需要首先在基金组织内部博弈达成;另一方面,这些改革事项又需在一国内部进行充分博弈以求征得通过。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博弈使得基金组织改革难度增大。例如,在二十国集团的推动下,基金组织执董会在2010年11月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IMF,2010),但由于美国国会迟迟未能批准,该方案一直未能生效。直到2015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邦政府《2016财年综合拨款法案》,该改革方案才最终在2016年1月生效。

美国在基金组织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它拥有超过15%的基金组织投票权。由于基金组织重大决策事项都需要总投票权的85%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在重大事项中具有一票否决权。美国重大事项的否决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美国在基金组织的理事,二是来自美国国会。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国会面临的博弈主体更多,涉及的因素更广,达成基金组织改革决议的难度更大。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日益严重,民主与共和两党分歧不断加大,国会决策效率有所降低,在事关基金组织改革的问题上决策日益拖沓。

因此,本文以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相关决策事项的授权为分析对象,重点回答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国会对基金组织改革的态度。本文分别从国会单个议员层面和国会整体层面分析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议案批准授权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认为,议员所属党派、意识形态倾向、利益集团、选区利益都是影响国会议员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重要因素;同时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状况也会对基金组织相关议案决策产生影响。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美国国会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从议员个人层面和国会整体层面构建美国国会影响基金组织议案的分析框架,第五部分是经验分析,最后是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二 相关文献综述

(一)美国国会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

国际经济谈判往往涉及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Putnam(1988)认为大多数国际谈判都可以看作双层博弈。在国家层面,国内集团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决策者采取对其有利的政策;在国际层面,一国政府除尽可能满足国内要求外,还要极力争取最小化对外政策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国际谈判中,一国领导人除了在国际上与对应国家的领导人及其外交官、国际事务顾问打交道外,还会与国内的政党要员、国会议员、主要利益集团的代表等打交道。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总统和国会是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谈判的两个最重要的主体。早期观点认为,总统在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相对较少地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 Wildavsk(1966)指出在国内问题和国际事务中有“两种总统支配权”,相比国内问题,总统在对外政策决策上拥有更大的权力,从而较少受到国会的制约。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形势发生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会对政府预算活动的介入^①。1974年美国建立国会预算程序,这给予国会独立于行政部门进行决策的机会,预算程序本身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Bennet,1978)。Milner和Tingley(2015)通过观察国会投票数据和总统与国会关于财政预算的互动关系发现,一些对外政策像国内问题一样,也受到国会和国内其他力量的限制,这需要总统与国会不断进行谈判。

国际经济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贸易、金融、投资和援助这四个主要的国际经济政策领域中,国会的权限是不一样的(李巍,2010)。在贸易政策中,国会拥有的权利最大;其次是对外援助政策,行政机构制定的对外援助计划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国际投资政策则相对较为自由,受到国会的影响较小;国际金融政策由于专业程度较高,技术复杂程度令国会议员难以驾驭,因此国会一般将其决策让渡给财政部、美联储等部门。但即使如此,国会仍会通过公开发表意见、召开听证会、提出议案等方式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

^① 马丁(2010)指出立法部门(国会)主要通过监督权、拨款权和立法权三种间接机制来影响行政部门的外交政策。

从目前来看,贸易政策是国会介入最多的政策领域,大量文献研究国会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Baldwin(1985)针对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分析了国会议员投票背后的原因,阐述了政府和利益集团互动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成为研究国会与贸易政策关系的开创性文献(王孝松等,2014)。随后,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研究国会对美国相关贸易政策的影响,如Kahane(1996)研究了国会对关贸总协定相关政策的影响,Gilbert和Oladi(2012)研究了国会对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二)美国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影响因素

在国际金融领域,近年来有学者利用贸易领域的方法研究美国国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关系。Broz(2005)、Broz和Hawes(2006)分析了美国第98届国会和第105届国会参议院对基金组织拨款议案的投票,认为议员投票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倾向、所在选区利益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Broz(2005)认为与其他问题类似,美国对基金组织的拨款在国会也沦为一个自由—保守问题。持保守倾向的议员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发挥较小作用,而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造成了国际经济的激励扭曲,因此反对美国对基金组织进行拨款。而持自由倾向的议员认为基金组织可以克服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市场失灵,从而支持对其拨款。在选区利益和利益集团方面,Broz(2005)、Broz和Hawes(2006)认为增加基金组织融资规模有利于经济全球化,从而使高技术工人获益,因此高技术工人所占比例较大的州的议员更倾向于支持对基金组织的增资。货币中心银行被认为是支持对基金组织增资的利益集团,因为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为这些银行提供了实际的保险,因此,接受货币中心银行竞选资金越多的议员越倾向在基金组织增资问题上投赞成票。Broz(2008)考察了议员对美国向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增资问题的投票态度,研究结论与之类似。

与研究单个基金组织拨款议案不同,Broz(2011)从总体层面(国会)和微观层面(议员)分析了1944至2009年美国对基金组织增资议案在国会的投票情况。研究发现,从国会层面看,众议院对基金组织的支持力度不断下降,而参议院对基金组织的支持则相对稳定。从议员层面看,左翼议员比右翼议员更支持对基金组织增资,而在控制意识形态因素后,参议员比众议员更支持对基金组织增资,这可能因为众议员来自选区层面的压力比参议员更大一些。

除了上述文献所关注的个人意识倾向、选区利益和利益集团之外,也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分析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拨款的影响。Locke(2000)总结了在基金组织第11轮份额增资(1998年)国会反对向基金组织拨款的理由。第一,国会对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考虑趋于分散。冷战的结束使得国际紧张局势极大缓解,国会花在国内问题的

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传统的国际主义阵营面临瓦解。第二,政党分化(part fragmentation)严重,政党在对外政策立场上的分歧逐步加大。除了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差异外,党派内部也出现较大裂痕。例如,在关于基金组织的讨论中,秉持弗里德曼自由市场观点的共和党 and 秉持商业导向国际主义观点的共和党之间的差异并不比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差异小。

Henning(2009)指出尽管基金组织从多个方面推进美国利益,但国会并不总是对基金组织采取支持态度。这可能来自几个原因:首先,尽管基金组织的危机救援有利于美国经济,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美国从中获得的好处过于分散,也不易被国内利益集团捕获。因此,相关利益集团不会将基金组织改革作为政治议程的优先项。其次,国会议员对基金组织的政治关注度不高。基金组织与各个议员选区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与基金组织相关的立法和监督职责也是分散的,很少有议员愿意为基金组织积极游说奔走。最后,国会尽量避免以加强国际合作为借口而忽略国内问题,因此对于大多数议员来说,既不会广泛和强烈地直接反对基金组织,也不会给予其较高政治优先度。同时 Henning(2009)也指出,国会大多数议员反对基金组织只是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总体来看,与贸易领域相比,研究美国国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经验研究并不多,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引入工具变量克服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利益集团对议员的政治捐资会受到议员投票结果的影响,因此政治捐资具有内生性。本文利用各利益集团对议员的打分作为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工具变量,消除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和有偏性。第二,从国会整体层面考察国会对基金组织相关议案的影响。Broz(2011)尽管也从总体上考察了国会对基金组织态度的变化,但是主要分析参议院和众议院态度的差别。本文除了从国会内部观察各个议员对基金组织相关事项的态度外,还从国会整体层面考察议员面临的共同因素如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状况、国际经济与政治状况对基金组织相关议案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国会与基金组织议案的关系。

三 美国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的影响

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主要包括“投票表决”制度和“协商一致”原则(黄梅波和陈燕鸿,2014),其中投票表决包括“简单多数”通过和“特别多数”通过两种。简单多数通过是指超过总票数的50%通过,特别多数通过是指需超过总投票权的70%或者

85%通过。由于美国在基金组织中拥有超过15%的投票权,因此,在涉及到特别多数通过特别是85%多数通过时,美国对基金组织事项决定具有一票否决权,此时美国政府的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美国在基金组织中的决策授权主要来自《布雷顿森林协定法》(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该法对国会授权美国参与基金组织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具体来看,在以下6种行为中,除非得到国会授权,否则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任何个人和机构都不能代表美国行使对基金组织事项的决定权:(1)基金组织《协定》第三条第2款(a)下对美国在基金组织份额的任何修改;(2)《协定》附录C第2段、第4段、第10段下对于美元平价的建议;(3)《协定》附录C第6段下对于美元平价的任何修改,或者在附录C第11段下对于平价的普遍修改;(4)《协定》第二十八条下对于《协定》的任何修改;(5)对基金组织的任何借款;(6)对基金组织黄金的任何处置,除非财政部向国会证明处置对基金组织是必要的。以上6种行为大部分与《协定》“特别多数”决策事项挂钩,如《协定》第三条第2款、第四条第4款、第五条第12款、第十二条第6款、第二十八条a款以及附录C等,且大部分决策事项通过需要基金组织总投票权的85%同意,这意味着美国国会授权通过与否直接决定着基金组织决策事项能否通过。在以上6种行为中,第(1)项和第(5)项最为重要,两者均涉及美国向基金组织的拨款。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的开支必须经过国会同意并由总统签字才能生效。因此,国会大部分涉及美国对基金组织的拨款授权都是通过预算法案来进行的。例如1997年批准的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次修订(特别提款权一次性特殊分配)、2008年批准的《协定》第五次修订(份额特别增资)、第六次修订(黄金出售)、2009年批准的对新借款安排(NAB)的增资,都是在2009年《补充拨款法案》(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 2009)中获得通过的。

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的授权需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通过,并经过总统签字才能生效。对于基金组织相关事项,在参议院由对外关系委员会负责,在众议院由金融服务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由这两个委员会提出提案,交由全院进行表决,本院通过后再交由另外一院进行表决,参众两院地位相等,每一个法案必须版本完全一致并经由两院都批准通过才能提交总统签字。因此,从国会层面来看,对于相关提案表决的不确定性因素除了来自参众两院内部分歧外,还可能来自于参众两院间的分歧。例如对于建立新借款安排(基金组织1997年1月批准)和第11轮份额增资(基金组织1998年1月批准)方案,克林顿政府在1998年2月通过《1998财年补充和削减拨款法》(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nd Rescissions for FY1998)提交国会讨论,参议院通

过了该法案(H. R. 3579),但是众议院却将这一法案分为两个法案(H. R. 3579 和 H. R. 3580),最终导致该法案下对基金组织拨款的失败。

与此同时,尽管某些事项并不需要取得国会授权,但是仍需要与国会进行沟通。例如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伦敦峰会上宣布支持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由于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并未涉及到基金组织《协定》的修改,所以从美国政府方面来看,无需得到国会批准,但是仍需要和国会进行沟通。当年4月中旬,奥巴马政府即开始与国会领导人进行磋商,并与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等进行沟通,为当年7月份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的批准铺平了道路(Henning,2009)。

四 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部分从单个议员层面和国会整体层面建立一个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影响的分析框架。

(一)影响单个国会议员投票的因素

影响国会议员对美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及基金组织事项投票的因素众多。Schirm(2009)认为影响一国政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偏好的国内因素主要包括两个变量:一是国内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将会由于全球化的变化或新的全球治理的出现使其经济利益发生改变;二是意识形态,即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偏好,具体来说就是对政府如何影响市场的看法。在基金组织问题上,Broz(2005)认为议员立场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党派特征以及对基金组织未来改革的预期等。其假设议员行为都是自利的、并谋求连任,由于基金组织的政策并不是凸显性问题,因此议员在投票时将有更大的弹性来反映个人特征,比如意识形态。Broz(2005)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对基金组织的投票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个人意识形态、选区利益和利益集团。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影响美国国会议员对基金组织投票的因素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两大类。

一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影响主要在于议员持何种政治思想立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总体来看,民主党主流信奉新自由主义而共和党奉行新保守主义,两党在政府、市场、国际组织等问题上均具有不同的政策主张。具体来看,民主党主张扩大政府权限,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民主党虽然也崇尚市场经济,但是更主张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加大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而共和党则反对“大政府”,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

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事务上,民主党具有国际化倾向,希望通过国际组织和条约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实现美国利益,而共和党则反对美国全面介入国际事务,主张以现实主义为指导通过增加自身实力来实现美国利益。

不同党派议员的意识形态倾向分野日益严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倾向日益分裂,表现在共和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保守派立场,而民主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自由派立场(何晓跃,2014)。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治极化”日益严重,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党派意识形态分野来决定自身政治立场的现象在美国政治中日益突出,造成国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分歧愈来愈难以弥合,经常出现一党多数反对另一党多数的情况,这也是近年来基金组织议案在国会中迟迟难以通过的原因之一。

具体到基金组织而言,持自由主义倾向的民主党认为基金组织在危机时期的金融救援有效地克服了市场失灵,有助于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金融利益,因此民主党倾向支持基金组织相关改革议案。而持保守主义倾向的共和党则对基金组织的作用持否定态度,认为基金组织的金融救援扰乱了正常的市场功能,带来了激励扭曲和道德风险,因此对基金组织相关议案更多持反对态度。在后文的经验分析中,将分别对议员政党属性和意识形态倾向进行估计分析,由于政党是属于0或1的虚拟变量,而意识形态倾向是介于-1和1之间的变量,这有利于增加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二是经济因素。在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往往可以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等识别出国际贸易政策的利益获益者和受损者,据此判断一国内部哪些人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哪些人反对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对基金组织的分析中,由于基金组织更多与金融部门利益相关,很难像国际贸易政策分析那样通过生产要素划分不同利益阶层,因为金融业一般都被归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不同利益阶层对基金组织的态度呢?本文认为至少有两个部门倾向支持基金组织。一是金融部门,基金组织是全球化的有力支持者,其日常运行特别是危机救援机制有利于保持世界经济稳定,有利于维护美国金融部门在国内外的利益。二是出口部门,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定措施有利于维护美国出口市场的稳定,在金融危机时期甚至通过一系列贷款条件(如私有化、市场开放等)帮助美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因此,代表以上部门利益的议员将会倾向支持基金组织相关议案。

我们选取了两个影响议员投票的经济因素变量,分别是议员所在选区利益和利益集团政治捐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如果议员所在选区对外出口比例越高,金融

部门占本地区经济比重越大,他应该越倾向支持基金组织改革议案,反之会对相关议案漠不关心,甚至消极反对。从利益集团来看,如果议员接受金融利益集团和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越多,则越倾向于支持基金组织改革议案。

(二)国会整体层面因素对议员投票的影响机制

以单个议员作为独立研究样本,可能忽略议员面临的共同因素对于议员投票行为的影响。例如某一议案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这些因素对议员的投票行为影响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非对称的。但是在对单个议案投票行为的经验分析中,很难将这些共同因素进行剥离和界定,往往假设对议员的影响是对称的,这可能造成两方面的后果:第一,共同因素混合在议员个体因素中,使得对议员个体因素的估计产生偏差;第二,过于集中于议员个体因素的分析容易忽略掉共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时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不过,相比其他大多数议案,基金组织议案具有“反复性”、“多次性”的特点,这为观察共同因素对于议员投票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机会。以下我们从美国国内外政治经济方面考察共同因素对议员投票行为的影响。

一是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由于对基金组织改革事项的批准大都涉及到美国政府对于基金组织的拨款安排,因此美国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议员对于基金组织拨款议案的投票。但是国内经济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一方面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会缓解美国政府向基金组织拨款的压力,从而使国会更容易在基金组织改革议案上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状况良好也降低了美国向基金组织寻求帮助的需要,从而使国会对基金组织改革漠不关心。

二是美国国内政治状况。根据总统所属党派、参议院与众议院多数党派的关系可以将美国政府与国会的关系分为一致、弱分立、强分立三种情形(张光和刁大明,2008)。一般情况下,府会一致会提高美国政府的行政决策效率,而府会对立则使得相关决策获得国会通过的难度增大。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美国总统来自民主党、国会两院均由民主党占据多数,基金组织相关议案将会更容易获得通过;而如果总统为共和党、国会两院多数党为共和党时,基金组织议案将不易通过;其他中间情况则较难确定。

三是国际经济状况。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是基金组织重要职能之一,而这一职能的发挥有赖于它所持有的金融资源规模。因此,在世界经济动荡时期特别是美国经济受到较大冲击时,美国国会更容易批准对基金组织的拨款,以借助基金组织稳定世界经济与金融形势。如1980年通过相关议案的背景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石油危机,1983年通过基金组织议案是在拉美债务危机之后,1992年通过议案的背景是1990-1992年由美国引发并波及日本、欧洲等西方国家的世界经济危机。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国会都快速地通过相关基金组织议案,甚至一些久拖不决的议案也由于这些危机的爆发而得以推动。

四是国际政治状况。国际政治状况的变化有时也对基金组织议案带来影响。例如基金组织 2010 年改革方案曾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获得一线希望。当时美国政府宣布对乌克兰进行救助,并希望以此作为推动国会批准基金组织拨款议案的工具(Truman,2014)。2014 年 3 月,参议院和民主党希望能够将对乌克兰救助、对俄罗斯制裁与基金组织 2010 年改革方案联系在一起(Siddiqui,2014)。这一提议得到乌克兰政府和美国财政部的支持。美国财政部指出,批准 2010 年改革方案不但可以提高基金组织对于乌克兰的救援力度,同时也可以确保美国在基金组织的领导地位^①。不过,由于共和党反对将基金组织条款附入对乌克兰救助协议,国会对基金组织拨款再次搁浅。

通过以上分析,不同层面因素对议员投票的影响机制如表 1 所示。

表 1 影响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议案态度的机制框架

影响因素		支持基金组织改革	不支持基金组织改革	不确定
议员 个人 层面	政党	民主党	共和党	
	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选区利益	对外出口比重高,金融部门 经济比重大	对外出口比重低,金融部门 经济比重小	
	利益集团	金融利益集团 商业利益集团		
国会 整体 层面	美国国内经济			影响不确定
	美国国内政治	总统来自民主党、国会两院 由民主党占据多数	总统来自共和党、国会两院 由共和党占据多数	府会不一致 影响不确定
	国际经济	经济动荡时期	经济平稳时期	
	国际政治			影响不确定

五 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经验分析

(一) 议员对议案投票的经验分析

我们的经验分析以每一名国会议员(参议员、众议员)为一个样本观测值,其对基

^①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2304.aspx>, March 4, 2014.

金组织拨款议案如果投赞成票设定为 1, 投反对票则设定为 0。设定的基准模型估计形式如下:

$$Vote_i = \alpha_0 + A'_1 [Democrat_i, DW_i, Senator_i, Member_i, Term_i]' + A'_2 [FinContr_i, BusContr_i]' + A'_3 [Trade_i, FinEm_i, FinAsset_i]' + \mu_i \quad (1)$$

其中, $Vote_i$ 为国会议员 i 的投票结果, $Democrat_i$ 、 DW_i 、 $Senator_i$ 、 $Member_i$ 、 $Term_i$ 分别刻画议员 i 的政党属性、意识形态倾向、是否是参议员、是否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针对参议员)或金融服务委员会成员(针对众议员)、议员的任职年限。其中意识形态倾向采用 Poole 和 Rosenthal(1997) 制定的国会议员价值观 DW 指数第一维度值, 主要测度议员在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 该指数介于 -1 到 +1 之间, 其中 -1 为最自由, +1 为最保守。 $FinContr_i$ 、 $BusContr_i$ 分别为金融利益集团、商业利益集团对议员 i 的政治捐资, $Trade_i$ 、 $FinEm_i$ 、 $FinAsset_i$ 分别为议员 i 所在州出口占 GDP 的比例、金融部门的就业比例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 用以反映议员所在选区的经济特征。 A'_1 、 A'_2 、 A'_3 分别为对应的系数矩阵。 μ_i 为残差。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重点考察 2009 年美国第 111 届国会对基金组织拨款的投票行为。第 111 届国会共讨论批准了四项关于基金组织的拨款事项。一是对基金组织《协定》进行第四次修订以进行一次特别提款权特殊分配; 二是对《协定》进行第五次修订, 对相关成员国份额进行特别增资; 三是对《协定》进行第六次修订以扩大基金组织的投资权限; 四是扩大新借款安排的资金规模。以上四项安排囊括在《2009 财年补充拨款法案》中, 该法案分别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和 18 日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我们采用最终投票结果数据。相关变量见表 2。

1. 基本模型估计结果。我们使用 Probit 模型对(1)式进行估计。考虑到当前美国政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自由与保守倾向日益明显, 因此, 国会议员的党派属性和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如果将二者同时放入方程进行估计, 可能产生较为严重的共线性。因此, 在对公式(1)估计中, 我们对政党和意识形态变量分别进行估计。表 3 汇报了基本模型估计结果。

表 3 第(1)列是去除意识形态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第(2)列为去除政党属性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第(3)列和第(4)列加入是否是参议员虚拟变量。从估计结果来看, 政党属性(Democrat)均显著为正, 表明民主党议员对于基金组织议案持更大的支持态度, 其支持基金组织议案通过的概率约是共和党议员的 2-3 倍。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符的。

表 2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i>Vote</i>	两院议员投票结果(支持为1,反对为0)	0.604	0.489
<i>Democrat</i>	是否是民主党(是为1,不是为0)	0.587	0.493
<i>DW</i>	DW 指数(第一维度)	0.070	0.511
<i>Senator</i>	是否是参议员(是为1,不是为0)	0.180	0.384
<i>Member</i>	参议员是否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众议员是否是金融服务委员会成员(是为1,不是为0)	0.172	0.378
<i>Term</i>	议员的任职时间(年)	12.272	9.671
<i>FinContr</i>	金融利益集团 ^a 政治捐资(万美元)	26.962	44.205
<i>BusContr</i>	商业利益集团 ^b 政治捐资(万美元)	14.259	18.399
<i>Trade</i>	各州出口占 GDP 的比例	0.070	0.031
<i>FinAsset</i>	各州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10 亿美元)	384.038	562.140
<i>FinEm</i>	各州金融和保险行业就业人员比例	0.054	0.012

说明:^a 金融利益集团包括保险公司、证券和投资公司、房地产公司和商业银行等;^b 商业利益集团包括纺织业、钢铁业、化工行业、消费品零售业、餐饮业等。

数据来源:美国国会、Voteview、美国保守联盟、Open Secrets、美国商务部、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网站。

表 3 议员投票基本模型估计结果

方程	(1)	(2)	(3)	(4)
<i>Democrat</i>	2.235 ^{***} (0.000)		2.967 ^{***} (0.000)	
<i>DW</i>		-2.135 ^{***} (0.000)		-2.530 ^{***} (0.000)
<i>Senator</i>			2.951 ^{***} (0.000)	2.440 ^{***} (0.000)
<i>Member</i>	-0.178 (0.379)	-0.189 (0.345)	-0.473 [*] (0.050)	-0.407 [*] (0.077)
<i>Term</i>	0.018 ^{**} (0.019)	0.005 (0.470)	-0.005 (0.602)	-0.014 [*] (0.090)
<i>FinContr</i>	0.013 ^{**} (0.013)	0.015 ^{***} (0.005)	0.012 [*] (0.054)	0.013 ^{**} (0.031)
<i>BusContr</i>	-0.009 (0.364)	-0.010 (0.298)	-0.009 (0.465)	-0.008 (0.473)
<i>Trade</i>	-0.697 (0.766)	-0.453 (0.844)	3.090 (0.279)	1.847 (0.483)

(续表 3)

方程	(1)	(2)	(3)	(4)
<i>FinEm</i>	-9.156 (0.164)	-8.493 (0.183)	1.961 (0.807)	-0.871 (0.907)
<i>FinAsset</i>	-0.000 (0.322)	-0.000 (0.278)	0.000 (0.775)	0.000 (0.925)
常数项	-0.742* (0.080)	0.743* (0.070)	-2.183*** (0.000)	0.103 (0.829)
伪 R ²	0.431	0.408	0.607	0.534
样本数	518	518	518	518

说明: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p 值。下表同。

意识形态倾向(DW)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国会议员自由意识倾向越明显(DW 值越小),其对基金组织议案的支持力度越大,这与预期也是一致的。当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意识形态分野严重,民主党秉承“自由”意识,而共和党则日趋“保守”,因此,从估计结果看,政党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估计系数呈现负相关。

利益集团方面,各列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获得金融利益集团政治捐资越多的议员越支持对基金组织的拨款议案。由于基金组织的重要使命之一是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因此增强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有利于维护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在国内外的利益。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各列系数均不显著,这可能来自两个原因:一是相比于金融市场,基金组织对于国际贸易市场的干预更多来自于间接机制,这使得商业利益集团并不关注基金组织改革;二是如前文指出的,商业利益集团可能由于出口市场的稳定而获益,也可能由于进口增加而受到冲击,本文并未从出口和进口角度界定商业利益集团,这也可能导致其捐资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影响不显著。

选区利益方面,估计结果显示议员所在州的贸易状况和金融状况对议员投票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基金组织议案的利益讨论并没有在州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可能是由于基金组织与各个选区之间的利益关系过于间接而没有得到关注(Henning, 2009)。

参议员和众议员对于基金组织议案的态度有明显不同。从估计结果看,参议员比众议员更支持基金组织议案。这与 Broz(2011)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认为由于基金组织相关利益不容易在选区层面捕获,因此众议员(其相比参议员受到更大的选区利益压力)对基金组织的议案更漠不关心,而参议员由于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力度更高,往往会根据行政部门决策更为客观地对基金组织议案做出选择。

议员个人特征方面,第(1)列估计结果中任职期限估计系数较为显著,表明议员的任职年限越长,越支持对基金组织的投票。这可能是因为议员的任职年限越长,他对基金组织相关认识积累越多,同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越少,从而可以和行政部门决策一致。第(3)和第(4)列估计结果中,是否是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如果议员是相关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将比其他议员更不支持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这部分反映了当前美国对于基金组织的态度:美国认为基金组织的作用在下降,因此不愿支持基金组织改革。由于专业委员会对议案的意见至关重要,这也说明为什么近年来基金组织议案在国会迟迟不能通过。但总体上,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不够稳健,我们认为其对议员投票的影响不显著。

2. 稳健性估计结果。由于利益集团对议员的政治捐资会受到议员投票结果的影响,因此政治捐资具有内生性。为保证结果的无偏性,我们引入工具变量,用相关利益集团对议员的打分作为政治捐资的工具变量。一般情况下,美国不同利益集团每年(或不定期)都会对国会议员进行打分评估^①,如果对其打分越高,表示议员的投票行为与该利益集团的行为越一致,因此利益集团对议员的政治捐资越多。金融利益集团打分采用全球交流组织(Global Exchange)针对各议员在金融、保险、房地产相关议案上的打分^②,商业利益集团打分采用美国商会对各议员的打分。由于在本文考察期内各利益集团打分议案均不涉及基金组织相关议案,因此,我们认为对基金组织议案的投票结果并不会影响利益集团对议员的打分,从而使用利益集团打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治捐资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与此同时,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采用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美国保守联盟对各议员的打分来刻画各议员的意识形态倾向,替代DW值进行检验。各利益集团打分情况如表4。

表4 利益集团对议员的打分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i>FIRE</i>	美国金融部门打分(满分为1),2006-2012年	0.517	0.343
<i>COC</i>	美国商会打分(满分为1),2009年	0.589	0.211
<i>ACU</i>	美国保守联盟打分(满分为1),2009年	0.414	0.426

数据来源:全球交流组织、美国商会、美国保守联盟网站。

① 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及其打分情况可参见 <http://votesmart.org/interest-groups>。

② 像其他利益集团一样,金融利益集团的打分也应取自2009年,但由于全球交流组织只提供2006至2012年间各议员总体打分情况,我们用这个总体打分近似替代。

我们引入工具变量对(1)式进行两阶段估计。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分别将金融利益集团政治捐资和商业利益集团政治捐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对相应工具变量以及其他所有控制变量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金融利益集团政治捐资和商业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拟合值^①。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利用拟合值对(1)式进行估计。表5为利用工具变量的最终估计结果。其中,第(1)和第(2)列分别为去除意识形态倾向变量和去除政党属性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第(3)列为利用美国保守联盟对议员打分(ACU)替代议员DW值的估计结果,第(4)、(5)、(6)列加入了是否是参议员虚拟变量。

表5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方程	(1)	(2)	(3)	(4)	(5)	(6)
<i>Democrat</i>	2.493 *** (0.000)			3.371 *** (0.000)		
<i>DW</i>		-2.260 *** (0.000)			-2.691 *** (0.000)	
<i>ACU</i>			-0.028 *** (0.000)			-0.042 *** (0.000)
<i>Senator</i>				0.066 (0.934)	1.079 (0.247)	0.141 (0.838)
<i>Member</i>	-1.012 *** (0.002)	-0.748 ** (0.017)	-0.970 *** (0.001)	-1.111 ** (0.013)	-0.546 (0.308)	-1.083 ** (0.010)
<i>Term</i>	-0.008 (0.454)	-0.011 (0.293)	-0.008 (0.389)	-0.021 ** (0.040)	-0.023 ** (0.017)	-0.024 ** (0.013)
<i>FinContr</i>	0.049 *** (0.000)	0.039 *** (0.003)	0.049 *** (0.000)	0.045 ** (0.040)	0.020 (0.479)	0.046 ** (0.028)
<i>BusContr</i>	0.071 * (0.084)	0.019 (0.656)	0.040 (0.240)	0.175 *** (0.002)	0.084 (0.181)	0.208 *** (0.000)
<i>Trade</i>	3.016 (0.248)	2.030 (0.423)	2.980 (0.253)	4.674 (0.130)	2.520 (0.370)	5.087 (0.119)
<i>FinEm</i>	-45.43 *** (0.000)	-31.13 *** (0.005)	-43.96 *** (0.000)	-51.04 ** (0.010)	-22.17 (0.335)	-63.28 *** (0.001)
<i>FinAsset</i>	-0.001 *** (0.002)	-0.000 ** (0.046)	-0.000 *** (0.008)	-0.001 *** (0.002)	-0.000 (0.141)	-0.001 *** (0.000)
常数项	-0.617 (0.250)	1.076 * (0.050)	2.272 *** (0.000)	-1.888 ** (0.013)	0.218 (0.803)	1.948 ** (0.011)
伪R ²	0.437	0.392	0.417	0.622	0.521	0.610
样本数	518	518	518	518	518	518

① 限于篇幅,本文省略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最终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来自民主党、意识形态越趋向自由的议员将会对基金组织拨款议案更加支持,同时如果议员获得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越多,其对基金组织议案的支持力度也越大,这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说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国会议员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在工具变量估计中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二者对基金组织议案的影响并不显著。商业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系数在第(4)和第(6)列估计较为显著,表明议员得到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越多,其对基金组织拨款议案的支持力度越大。但总体上看,商业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系数估计并不稳健。选区利益方面,估计结果与基本模型的估计基本一致。议员所在州的贸易状况对议员投票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贸易状况并不是影响议员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关键因素。但金融状况却对议员投票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合专业委员会委员(Member)的估计系数为负,可以推断,与基金组织关系较为紧密的议员对基金组织的表现不满,认为其在维护美国金融利益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金融利益集团政治捐资和选区金融状况对议员投票行为的影响方向截然相反,原因可能来自两个:第一,金融利益集团更多代表美国国际金融机构的利益,而选区金融状况更多反映国内金融机构的利益;第二,金融利益集团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国内金融精英阶层的利益,而选区金融状况代表的是美国国内与金融机构存在紧密联系的普通大众的利益。二者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其对议员投票行为的不同影响。

表5第(3)和第(6)列分别为利用美国保守联盟对议员打分(ACU)替代议员DW值的估计结果。ACU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议员意识形态越趋于保守(ACU分数越高)越不支持基金组织的拨款议案。同时,其他估计系数也与利用DW值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此前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二)国会整体因素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影响分析

为了从国会整体层面考察各个因素对国会关于基金组织拨款议案的影响,我们估计如下模型:

$$Vote_t = \beta_0 + \beta_1 \cdot President_t + \beta_2 \cdot Senate_t + \beta_3 \cdot House_t + \beta_4 \cdot USGrowth_t + \beta_5 \cdot WorldGrowth_t + \beta_6 \cdot Period_t + \varepsilon_t \quad (2)$$

其中, $Vote_t$ 为第 t 年美国国会对相关基金组织议案的批准情况。 $President_t$ 表示第 t 年美国所属党派(民主党为1,共和党为0), $Senate_t$ 和 $House_t$ 分别表示第 t 年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党派别(民主党为1,共和党为0),以上三个变量刻画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基金组织议案的影响。在经验检验中,除了对总统党派、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党派别进行分别估计外,我们还进行了综合估计。 $USGrowth_t$ 和 $WorldGrowth_t$

分别是第 t 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率。 $Period_t$ 表明第 t 年基金组织议案是否是周期性的份额增资(是为 1, 不是为 0), 该变量表明不同议案下国会的态度^①。 ε_t 为残差。我们使用 Probit 模型对(2)式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6。

表 6 国会整体层面估计结果

方程	(1)	(2)	(3)	(4)	(5)	(6)
<i>President</i>	0.155 (0.748)			0.583 (0.351)		0.474 (0.517)
<i>Senate</i>		0.790 (0.141)		-0.166 (0.810)		-0.555 (0.505)
<i>House</i>			1.696*** (0.004)	1.919** (0.011)	1.900*** (0.007)	2.354** (0.016)
<i>USGrowth</i>	0.259 (0.171)	0.351* (0.074)	0.440** (0.037)	0.366* (0.094)	0.506** (0.040)	0.435* (0.099)
<i>WorldGrowth</i>	-0.290 (0.274)	-0.385 (0.155)	-0.565* (0.070)	-0.480 (0.135)	-0.645* (0.063)	-0.554 (0.128)
<i>Period</i>					1.138* (0.069)	1.191* (0.073)
常数项	-0.240 (0.702)	-0.651 (0.319)	-0.806 (0.236)	-1.210 (0.162)	-1.562* (0.062)	-1.872* (0.087)
伪 R ²	0.058	0.110	0.291	0.312	0.382	0.400
样本数	32	32	32	32	32	32

第一, 总统党派和参议院多数党派别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表明这两个变量对国会通过基金组织改革议案的影响并不如预期那么明显。第二, 众议院多数党派别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民主党在众议院获得领导权将会促使国会更高概率地通过基金组织相关议案。通常情况下, 基金组织相关议案在众议院的争论更为激烈一些, 因此能否在众议院通过显得至关重要。实际上, 很多情形下基金组织议案都是在众议院“折戟”。例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建立新借款安排和第 11 轮份额增资方案, 1998 年 3 月参议院首先获得通过, 但是在众议院却没有达到共识从而失败, 最终在当年 10 月才获得通过。

①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1962 年至 2015 年。如果当年有相关基金组织议案获得国会通过, $Vote$ 值为 1, 没有获得通过则为 0。我们去掉了没有基金组织议案在国会进行讨论的年份, 估计样本为 32 个。数据来源如下: (1) 历年基金组织相关议案投票情况来源于美国国会网站和政府追踪网站; (2) 美国国内政治变量数据来源于美国白宫网站、美国参议院网站和美国众议院网站; (3) 美国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4) 世界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5) 是否是周期性价额增资数据来自基金组织网站。

基金组织 2010 年改革方案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形。第三,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增长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良好的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有利于国会通过基金组织改革议案。第四,世界经济增长系数为负,表明世界经济增长状况不佳反而有利于国会通过基金组织议案,但是总体来看其系数并不显著。第五, *Period* 的系数为正,表明对于周期性的份额增资议案,国会通过的概率更大一些。

在经验分析基础上,我们从实际情况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与基金组织议案的关系重新做一个考察,以对估计结果进行印证和校正。首先看美国政治因素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府会是否一致对于基金组织议案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多数议案都是在府会强对立的情况下获得通过的,例如福特政府时期的 1976 年议案、老布什政府时期的 1989 年议案和 1992 年议案、克林顿政府时期的 1998 年议案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2015 年议案等。梳理历史发现,在参议院特别是众议院由民主党多数控制时,基金组织相关议案更容易通过。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美国国会通过的 9 项基金组织议案中,由民主党占据参议院多数时通过的议案为 6 个,民主党占据众议院多数时通过的议案为 7 个。这与我们的经验估计结果一致。

再看美国经济因素的影响。为考察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本文选择 1962 至 2015 年美国年平均增长率作为基准,高于平均值表明美国经济增长较好,低于该值则表明经济增长状况较差,以此对应和基金组织议案的关系。通过对比发现,对于大部分议案,如果该年美国经济增长状况较好确实有利于议案通过,如 1976 年(美国经济增长 5.4%)、1978 年(美国经济增长 5.6%)、1983 年(美国经济增长 4.6%)等。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如 1980 年议案通过时美国经济增长为 -0.2%,2009 年议案通过时美国经济增长为 -2.8%,这可能是由这两个时期都曾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并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冲击,美国亟需通过基金组织来稳定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

六 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继续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票权和发言权,不但事关基金组织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且事关整个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作为基金组织的第一大股东,美国一直在基金组织各项改革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研究分析美国特别是其国会对基金组织改革的决策行为,对继续推进基金组织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美国第 111 届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为例,从议员个人和国会整体

两个层面考察了美国国会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影响。从议员个人层面来看,利用工具变量的 Probit 估计结果显示,议员所属党派、意识形态倾向、利益集团、选区特征都是影响国会议员对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议员如果为民主党、其自由意识倾向越明显、获得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越多,议员对基金组织拨款议案的支持力度将会越大。议员所在州的金融产业越发达他对基金组织议案的支持力度却越小。从国会整体层面来看,议员面临的共同因素如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状况、国际经济与政治状况也会对基金组织相关议案产生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对于基金组织相关议案能否通过非常重要,与此同时,良好的美国经济增长状况也会提高国会通过基金组织相关议案的概率。

本文的结论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美国国会多年来迟迟未能批准基金组织 2010 年改革方案。首先,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倾向日益“极端”和“保守”。例如从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 DW 值来看,1995 年之前国会议员的 DW 均值为负值(表现为自由倾向),但是此后转为正值并不断上升,113 届(2013-2014 年)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 DW 值的平均值已经达到 0.18,这说明国会议员平均意识倾向已经从自由转为保守,且“保守性”正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国会议员 DW 值的标准差日益扩大,表明国会议员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在增大,国会议员之间关于自由一保守问题的立场更不容易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共和党不但对基金组织持否定态度,并且不愿批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任何议案(Vestergaard 和 Wade, 2015)。

其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利益集团的行为模式可能发生改变。受金融危机冲击,一方面美国国际霸权地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救助范围却不断扩大,这导致美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发生转换(刘玮和邱晨曦, 2015)。美联储的货币互换安排重新兴起,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中的作用有所下降,相应地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对基金组织的支持力度也有所降低。

最后,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表现并不十分强劲。在经过 2008 和 2009 年两年的负增长之后,美国经济虽有所恢复但增长动力仍然不足,2011 至 2015 年美国年平均经济增长只有 2%,远低于其历史平均水平。美国不佳的增长状况未能能为国会通过基金组织改革提供有利条件。

然而,美国国会为什么在 2015 年 12 月能够通过 2010 年改革方案呢? 本文认为以上反对议案通过的因素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可能有其他因素发生了作用。首先民主党与共和党可能在相关议案上进行了利益交换,例如有报告称奥巴马政府废除石油出口禁令,以此来换取共和党对基金组织议案的支持(RISS, 2016)。其次,共和党对

基金组织议案施加了大量条件,例如废除基金组织的“系统性风险免除”条款,对美国参与新借款安排施加限制条件等,此举使国会(共和党)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国参与基金组织活动的限制。这说明议员投票行为是一个受到众多因素影响的过程,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本文的研究也需要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 何晓跃(2014):《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与生成逻辑》,《国际展望》第1期。
- 黄海波、陈燕鸿(20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李巍(2010):《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玮、邱晨曦(2015):《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国际政治研究》第3期。
- 马丁(2010):《民主国家的承诺:立法部门与国际合作》(刘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孝松、谢申祥、翟光宇(2014):《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监督法案”投票结果分析》,《世界经济》第4期。
- 张光、刁大明(2008):《美国国会议员涉华提案初探》,《国际政治科学》第1期。
- Baldwin, 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Import Poli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 Bennet, D. “Congress in Foreign Policy: Who Needs It?” *Foreign Affairs*, 1978, 57(1), pp. 40–50.
- Broz, J. L. “Changing IMF Quota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 Ariel Buira, eds., *Reform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London: Anthem Press, 2005.
- Broz, J. L. “Congressional Voting on Fund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08, 3, pp. 351–374.
- Broz, J. L.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IMF Financing, 1944–200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11, 6(3–4), pp. 341–368.
- Broz, J. L. and Hawes, M. B. “Congressional Politics of Fin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6, 60, pp. 367–399.
- Gilbert, J. and Oladi, R. “Net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gricultural Interests, and Votes on Liberalizing Trade with China.” *Public Choice*, 2012, 150(3), pp. 745–769.
- Henning, C. R. “US Interes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 PB09–12, 2009.
- IMF. “IMF Executive Board Approves Major Overhaul of Quotas and Governance.” IMF Press Release, No. 10/418, November 5, 2010.
- Kahane, L. H. “Congressional Voting Patterns on NAFTA: An Empiric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ology*, 1996, 55, pp. 395–409.
- Locke, M. “Funding the IMF: The Debate in the U. S. Congress.” *Finance & Development*, 2000, 37(3), pp. 56–59.
- Milner, H. V. and Tingley, D. H. *Sailing the Water's Edge: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Poole, K. T. and Rosenthal, H. *Congress: 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 New York: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97.

Putnam, R.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8, 42(3), pp. 427-460.

RISS (Russi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East vs. West: Battle for Re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RISS Report. No. 1/2016, 2016.

Schirm, S. A. "Ideas and Interest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omparing German and US Preference Format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22(3), pp. 501-521.

Siddiqui, S. "Ukraine Aid Stalls as Congress Spars Over IMF Reform." *The Huffington Post*, March 25, 2014.

Truman, E. M. "IMF Reform Is Wait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 14-9, 2014.

Vestergaard, J. and Wade, R. "Trapped in History-The IMF and the US Veto."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cy Brief, April 2015.

Wildavsky, A. "The Two Presidencies." *Transaction*, 1966, 4, pp. 7-14.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MF Reform: The Case of the U. S. Congress Voting

Xiong Aizong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Probi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U. S. Congress on the voting of the IMF's bil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individual legislators and the overall Congress. From the form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kelihood that a legislator supports the IMF reform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he or she is a Democrat, the degree of liberty in his ideology and the contribution he received from interest groups. However,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a constituency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oting behavior of its legislator.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the Congress, if the Democratic Party holds the majority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n the Congress is more inclined to approve the reforms of IMF. Meanwhile, a faste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helps promote the congressional approval of the IMF reform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U. S. congres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JEL code: F33, F53, F55

(截稿:2017年6月 责任编辑:曹永福 王 徽)